

鲁迅为何说“不爱江南”

·黄健·



汉代石刻

日的亡故了。

如同他的好友瞿秋白先生所描述的那样，正是童年和青少年成长期的人生遭遇，改变了鲁迅十三岁以前的人生方式，使他获得了不同的人生体验和感受，他说：

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得他真像吃了狼的奶汗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他能够真正斩断“过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贵族的宫殿，他从来没有摆过诸葛亮臭架子的。他从绅士阶级出来，他深刻地感觉到一切种种士大夫的卑劣，丑恶和虚伪。他不惭愧自己是私生子，他诅咒自己的过去，他竭力的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旧茅厕。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鲁迅不喜欢江南，并非引发他对江南的“仇恨”心理，事实上，他后来对以自己故乡为代表的江南水乡的情景描绘，包括他笔下的乌篷船，黄酒，鲁镇，百草园，三味书屋、村庄、农舍、外婆家的桥等等，充满生机，也寄予了他对故乡、对江南的一片深情。

一般而言，在论及江南具体的人和事时，他对留存在江南的那种愚昧、麻木、落后、无知的国民劣根性，对江南地区所充斥着的腐朽、落后的传统习俗，对长期生活在江南区域的人所形成的那种“小气”性格，等等，是持否定、批评态度

的，这是由他的人生观所决定的。在他看来，应站在现代人生的价值立场上认识江南，尤其是认识其中的那些不适应现代人生、现代文明的地方，这样才能让人们把握江南、江南文化的内蕴。

“中国全土必须沟通”

中国的区域文化中，江南文化是最具有诗意的。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由三次重要的南迁事件（“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而形成的江南文化，成为无数文人骚客的精神原乡，使他们能够寄情于江南的山山水水，力求摆脱世俗琐事的纠缠，在对象中获得审美灵感，获得“宁静致远”的人生格调，达到心灵超然的境界。

然而，对于江南文化的这种特点，鲁迅则是将其置于整个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来予以认识和把握的。他认为在中国文化遭遇现代西方文化冲击而导致转型的特定时期，对它的否定和批判应大于肯定和赞扬，而否定和批判，是为了更合理、更全面的扬弃、更新和复兴。如同他在《看司徒乔君的画》一文中，称赞画家司徒乔所画的那些“在黄埃漫天的人间，一切都成土色，人于是和天然争斗，深红和绀碧的栋宇，白石的栏干，金的佛像，肥厚的棉袄，紫糖色脸，深而多的脸上的皱纹……凡这些，都在表示人们对于天然并不降服，还在争斗”的北方景色组画，“表示了中国人的这样的对于天然的倔强的灵魂”。同时，他也称赞了他所画的“和北方风景相对照”的，那“热烈”“明丽”的，体现了“作者的本色”的江南（南方）系列风光组画：“爽朗的江浙风景，热烈的广东风景”等组画。

在文章的结尾处，他特意强调：

中国全土必须沟通。倘将来不至于割据，则青年的背着历史而竭力拂去黄埃的中国彩色，我想，首先是这样的。

在《两地书》中，他说：

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没有别的路。

既然“老中国”是一只“黑色的染缸”，那么，即便是人称诗意的江南，也自然无法洁身自好，一花独秀。

鲁迅在创作中也十分注重从自己熟悉的江南的人和事当中择取题材，提炼主题，像鲁镇、未庄等一类的江南闭塞的小镇或村庄，实际上是与“老中国”一样的模态，而对其中的人和事的描写，引发的是他对整个民族的生存境况、前途和命运的高度关注。

向往大气之美

鲁迅说江南的景“秀气”，而江南的人“小气”，宣称：

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现在虽然大抵改穿洋服了，内容也并不两样。

他甚至还对苏州话（吴语）也表示出不喜欢的情感，称其“令人肉麻”。这种看似极具私人情绪性的言论，其实也是他对国民劣根性所作的一种批判，同时与他内心所向往的那种阔大、恢弘的“汉唐气魄”的文化审美有着密切关联。据许寿裳先生回忆，在谈及汉画像时，鲁迅曾对他说：

汉画像的图案，美妙绝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

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

后来，他又明确指出：

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利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

鲁迅为什么特别喜爱汉代石刻画像，高度称赞“汉唐气魄”呢？除了个人喜爱的因素之外，这与整个汉唐处在上升时期的精神气象有着密切的关系。汉承秦制，则又多加改进，这样，整个汉代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运动、上升的态势，如同学者李泽厚所描述的那样：

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运动和力量，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汉代艺术那种蓬勃旺盛的生命，那种整体性的力量和气势，是后代艺术所难以企及的。

反映在艺术、美学中的那种运动、古拙、力量、闷放、大气的精神及其所显示出来的张力，是鲁迅极为欣赏的，这也构成了他对江南“小气”不喜欢的一个重要缘由。

鲁迅还曾严厉批评了江南文人所推崇的那种刻意追求十全十美的病态审美心理，称之为是患了“十景病”或“八景病”。刻意的、凑数式的“全”，实际上限制了人的自由，限制了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创新力。

鲁迅崇尚“力之美”，认为那种力量型的“大气”之美，能够给处在现代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和现实人生，以强有力的精神振奋作用。早在写《斯巴达之魂》时，他就鼓吹宁死不屈的斯巴达精神。在《摩罗诗力说》中，更是大力推崇那些“刚健不挠”“争天抗俗”“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对中国古代的那些颇具“大气”风格的作品，也十分推崇，如对“楚声”的赞赏。（摘自《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1935年9月1日在写给萧军的私人信件中，鲁迅向他透露了自己的一个偏爱：

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的，但小气。

就行的行文语气来说，鲁迅这一表示主要是针对有人说萧军“土匪气”而言的，就鲁迅个人的喜爱来说，他也许更喜爱那种自由自在，且快意恩仇、豪爽勇猛、无拘无束的“土匪气”（或称“野气”），喜爱那种“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性格，而不喜欢“江南才子气”（或称“文人骚客”式）的那种忸怩作态，矫揉造作的“虚伪”或“伪善”。然而，这背后却深刻地反映出了鲁迅对江南、对江南文化的一种基本态度。那么，鲁迅为什么“不爱江南”呢？其背后的根源究竟有哪些？

童年际遇

鲁迅出生和成长于著名的江南名城绍兴，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因祖父“科场”案件而导致家庭变故，对他的人生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说十三岁以前，鲁迅还是生活在家境比较殷实的小康人家，体会不到人情的势利、世态的炎凉，那么，在这之后的生活中，他就不得不较早地在人情世故的巨大落差下感受人生、认识人生。他曾说：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的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高一倍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木地……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

说曾国藩是一个谦虚的人，肯定会得到不少人认同，而对他自负的一面，了解的人则不多。在诗文方面，曾国藩其实是个颇为骄傲的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三月初十日，在给六弟和九弟写信时，他就如此“狂妄”地说过：

余近来读书无所得，酬应之繁，日不暇给，实实可厌。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

曾国藩的这种高傲自负，到老都没有多大改变。同治六年（1867）六月十五日与赵烈文闲谈，他就毫不谦虚地说出了这种话：

人生无论读书做事，皆仗胸襟。今自问于古诗人中如渊明、香山、东坡、放翁诸人，亦不多让，而卒卒无暇，不能以笔墨陶写出之。惟此一事，心中未

免不足。足下胸襟大过于人，盍善抒其性灵，弗为尘土所淹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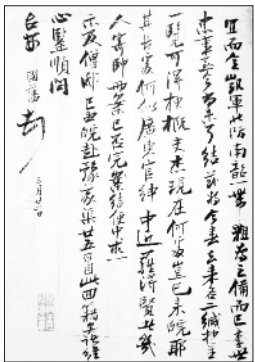
这年曾国藩57岁，再过几年就要作古了，还能说出这种话来，称他为“老夫聊发少年狂”是可以的。可能是难得见老师这么张狂，赵烈文于是马上建议他编辑出版自己的文集，曾国藩却又谦虚起来，说自己没有值得留给后人的东西，真是谦虚中有自负，自负中有谦虚。

曾国藩对自己的诗才之所以如此自负，是因为他曾下过一番苦功。道光二十五年（1845）三月初五日，曾国藩给四位老弟写信，谈到自己的学诗门径，曾说过：

吾于五七古学杜（甫）、韩

“自负”的曾国藩

·睦达明·



曾国藩的奏折

（愈），五七律学杜（甫），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外此则古诗学苏（轼）、黄（庭坚），律诗学义山（李商隐），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

正因为年轻时打下了扎实功底，所以他后来才会偶尔张狂一下，没有实力是不敢说大

话的。

曾国藩不仅对自己的诗歌天赋很自负，而且在散文写作方面也有相同的自许。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他到赵烈文那里聊天时，就毫不客气地表达了这层意思：

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游接。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贞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然使我有暇读书，以视数子，或不多让。

曾国藩一生勤于学习，刻苦钻研，不仅年轻时如此，而且后来行军、作战、政务繁忙之时也从未停止。他的古文创作，既宗法桐城，又有所变革和发展，且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文章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从而当之无愧地成为“桐城

——湘乡派”盟主。

还有他写的公文，既平实简练、情理交融，又能与实际相结合，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成为不少人仿效的榜样。如他在江西带兵打仗期间写的一些奏折，字字血诚，声声衷肠，王闿运读后深有感触说：

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

只是因为身陷官场，曾国藩不能继续文人事业，他为此常常感到苦恼和遗憾，不仅说自己“生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且“生平学术”也“百无一成”，所以“老年犹思补救一二”。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一日，也就是曾国藩逝世前三天，他在日记里还如此写道：

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

（摘自《同舟共进》2022年第3期）